一十八次全国党代会的历史细节与时代转折

□ 冉　昊

嘉兴南湖红船

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细究党史，会发现有很多疑问有待挖掘。比如，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为何距离六大间隔了整整17年？等等。历史的谜团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党建读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把揭开谜底的钥匙。

这本书告诉我们，早在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就把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可为什么“最不可延迟的任务”变成间隔最久的会议了？一方面，随着五次“反围剿”及长征的进行，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抗战的全面爆发又一次延迟了七大。193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进行准备工作”，部分地区选举了七大代表。1940年，甚至部分代表已经抵达延安。但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七大日程再次延迟。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之后才召开了中共七大会议。

原定的七大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交流和讨论。一开50天的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以问题引领叙事

《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的作者李颖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的撰写，长期跟踪研究党代会历史。她曾经在文章中讲述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5月，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延安，他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同于叙述党史教科书式的严谨或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这本书中，李颖采用了别具一格的方式：篇章全部采用问题的形式，共设计了109个问题。这使原本略显严肃的学术命题立刻脱掉了“阳春白雪”，引发普通读者的兴趣。例如：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八大党章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凡此种种，使学术问题通俗化、学理研究大众化，增加了可读性。这一个个问题如炮弹一样打出，直击读者内心的各种疑窦。此外，通过重重问题的设置，使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在增加文字通俗性的同时，文章的学理价值并没有丝毫减色。

如果说党史研究容易陷入大量历史材料的堆砌和历史沉渣的筛炼，那么最新史料的挖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的运用，则成为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对于中共六大的叙述，其中一个部分就采用了中央档案馆在2015年编选文献中的新发现，即在1928年六大会议期间使用的“中共六大会场规则”的原始文本。分“会场秩序”和“议事细则”两个部分，共列15项要求。议事细则规定得也特别详细。如“对于讨论之发言每人至多三次”，对于政治报告的讨论发言，要求第一次至多40分钟，第二次15分钟，第三次5分钟。同时指明：“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值日主席有权制止。”诸如此类的要求，保证了大会的高效进行。

点面相扣　纵横共振

单就史实的叙述而言，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纵横结合。纵向上说，全书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历次党代会的顺时演进。这根主线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几条纵向的支线。一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如监察制度的从无到有，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逐渐加强；二是党的基本理论体系如何通过党代会不断充实和完善，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再到“市场经济”表述的正式确立等。

横向上说，本书将历次党代会放到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叙述，既包括党代会召开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也包括其所处的社会和阶级基础，这样一来，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层次分明而时代感厚重。如中共五大之后，翌年即召开中共六大，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以及中共中央自身的改组等重大事件的出现；而中共七大到八大之间之所以间隔11年，与党和国家经历了国家性质和基本制度的两个重大变革有直接关系。

由此，历史纵向发展与时代横截面的结合，形成了对历次党代会叙事的点面相扣和纵横共振，奏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仁人志士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强音。

党代会的历史转折作用

过去我们往往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视了党代会全会本身在历史中的重大转折作用——它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制度性转折和对时代所起的历史性转折。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制度性转折。如1923年的中共三大专设了“中央局秘书”一职，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具有部分党中央“秘书长”的功能，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它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党内不同职务之功能权

界的划分，对党内最高领导权力加以制约的初步探索。

又如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即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中共一大纲领和二大相关决议都有对党员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但直到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及党纪党法的权威第一次有了相应的机构作为保证。

再如在中央组织制度方面，1982年中共十二大不再设主席和副主席，只设党中央的总书记，并由总书记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表明，如果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同时存在，往往导致其中一个有名无实，而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会产生制度性问题。

二是多次党代会所发挥的时代性转折效应。我们知道，中共早期的发展历程，都打上了深刻的共产国际烙印。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而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外国党或国际组织的指导。中共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召开的党代会，有关党代会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主，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思潮更迭，是继续推进市场，还是重新回到计划？人心不定。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指导，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邓小平同志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成为有胆魄之人开荒进取的“尚方宝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中国经济后来20余年的持续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恩格斯曾言，历史是我们的一切。而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则是党不断自我完善和推动时代发展的一切具象，是中国共产党、国家乃至民族由弱小变强大、历曲折而弥坚的生动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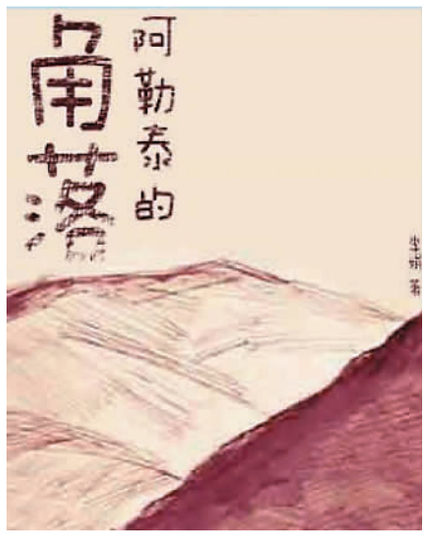
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信念与放弃，皆成为这个历史大熔炉中的一粒粒火星，一闪之后迅疾消逝于灰烬之中，我们怎能不细细察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来自生活的文字最动人

□ 倪慧娟



《阿勒泰的角落》（新星出版社出版）是作家李娟的一本散文集。李娟和妈妈开了一家裁缝店兼杂货铺，为了做生意，她们随着游牧牧民不停搬家，所以书中便有了“在喀吾图”“在巴拉尔茨”“在沙依横布拉克”“在桥头”“在红土地”五个部分。该书文字清新自然，人物刻写生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前后印刷了12次，共印了5万多册，可见受欢迎程度。

在阿勒泰，在每一个地方，都会遇见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生活。书中故事围绕着这个店铺展开。来店里做衣服、买东西的人们各有特点：拿三只鸡来换一条裙子的库尔马罕的儿媳妇，长年粗重的劳动和寒酸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到青春的灵气；实在太胖的温孜拉妈妈，给她做一条裙子真是太不容易了，她一个劲地道歉倒使裁缝下定决心要帮她做一件合身的裙子；生得高大英俊的纳得亚，整天穿着破裤子走来走去，舍不得花钱补一补……

她描写游牧生活中的点滴令人动容。一个8岁的孩子背着干粮、手持小柳枝、徒步四十多公里，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两天，就是为了把牛送回山下的家里。作者发出感慨，“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古老的、历经千百年都没什么问题的生活方式，它与周遭的生存环境平等共处，息息相关，也就成了一种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自然了”。

阿勒泰景色令人向往。那里，草甸深厚，河流浓稠，碧绿的山谷，闪耀着金光。就连一个普通的清晨，似乎也带着无限的光芒。“这时，远处的天空越来越蓝……突然，大地‘轰’地一片金黄，太阳从群山间升起来了！似乎也在同一时刻，羊群的咩叫声和牛哞声突然密集起来，一声声长呼短应。”

文中常常有字句让我感觉到李娟的率真可爱。在她写有翅膀的鱼的时候，描写“还有一个原因是：呃，我的鞋子太臭了……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写全家人都在干什么活的时候，描述“总之，就我懒，什么都不想做，我刚从外面回来嘛，正在休息嘛”；她在写妹妹谈恋爱的时候写到“听得我有些眼馋，简直想顶掉我妹妹自己嫁过去”，“想想看这么容易就能给人哄去，我妹也实在太可怜了，要是我的话，起码也得设九九八十一关……再想一想，也难怪我至今……”这样的语句怎么看都觉得作者真的很可爱。

李娟笔下的妈妈是一个多么勤快又可爱的人啊！为了能让屋子里的光线亮一点，她把家里的窗户拆装个遍，下面垒高，上面凿宽，要知道北疆的房子最薄也得五六十厘米呢；她养花、养鱼、养鸡、养狗、养兔子，总喜欢折腾；她把快要死的金鱼放双乳间暖着，直到金鱼活过来，还用这种方法孵过小鸡……好一个强大的妈妈啊！

李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煽情的语句，却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生命：劳力超能的妹妹，18岁的恋爱，羞涩而甜蜜；超级能干的继父叔叔，修鞋子、建房子、到结着厚厚冰层的河里挑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妈妈找了个好男人；90多岁的外婆一大早起来给一家人做饭，寻着炊烟而来的牧民们，也喝上了一碗热腾腾的粥；懂事的阿依邓，家里的大小家务全部拿下，还会用细长的手指弹电子琴……每一个人都努力地活着，谁又敢说他们的生活不动人呢！

李娟让我们似乎看到了美好的阿勒泰。风沙肆虐、蚊虫成堆、酷暑严寒、荒凉寂寞，可也是在那里，蓝天白云、星辰璀璨、白雪苍茫。在新疆，在阿勒泰，李娟用生动的文字描绘着那里的一切，那里的人，那里的事……

《中国图书馆史》面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史》，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国图书馆通史。全书共计200余万字，分为《古代藏书卷》《近代图书馆卷》《现当代图书馆卷》《附录卷》4卷，它融贯古今，在纵向上完整呈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将古代藏书楼到现当代图书馆的变迁视为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对先秦迄今3000多年藏书史及图书馆发展史进行了首次全面记录，填补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该书通过探讨中国图书馆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层面、类型的发展状况及相互关系，揭示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外在环境与内部机制，深入考察图书馆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变化和适应调整过程，关注其反作用于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对规划、指导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意义深远。

（张　鹏）

也谈“书话”

□ 路来森

这些年，书话书读得多了，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一些归纳。

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话。其基本界定源于唐弢《晦庵书话》中的一段话：“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最初写这类书话的人，大多是作家或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如唐弢、郑振铎、郑逸梅、邓云乡、黄裳、谷林等人。有人称此种书话为“文学书话”。

它的特点是：以散文手法表达，非学术性；于诸多方面多有涉猎，且点到为止，不过于求深、求透；在博人以识的同时，赠人以趣。

承其续者，大有其人。无名寂寂者，难可胜数，享有大名者，则如止庵、杨小洲、谢其章、陆灏等人。只是各人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文章风格亦是各具特色，特别是止庵的书话，其散文性、思想性、灵活性，似乎更强。止庵自己就曾说：“我曾竭力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

第二类是学术性、思想性书话，有人亦称之为“学者型”书话。其突出特点是以所读之“书”为中心，主要谈与“书”相关的内容，但又不至于“就书论书”，成为简单的书评；少掌故、少文人轶事，更少谈文人之间的琐屑交往。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却仍然是非学术性。常常是抓住与“书”有关的一点一滴，或从某一个角度切入，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张弛有度，闲闲写来，摇曳多姿、趣味盎然。

写此类书话的老一辈作家有鲁迅、孙犁等，年轻一辈有张宗子、胡文辉等人。张宗子曾坦言，其书话文章深受鲁迅、孙犁的影响，从其《往书记》《不存在的贝克特》《梵高的咖啡馆》等书中可看出端倪。胡文辉的书话则别具一格，片段式现象的“零碎”下，是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深刻的生命、社会思考，文化思想性极强；其代表作品是《反读书记》《拟管锥编》等书。

近些年，兴起了一种以谈古籍（善本书）为主的书话：谈善本收藏、古籍拍卖，版本、刻本等等。当然，谈“书”仍然是重点。这些书话，虽非专业性学术研究，却带有很强的学术性，有深度，彰显着作者丰厚的学养。这方面的作者，既有学有专长的学者，黄永年、辛德勇、陆昕等人，又有著名的民间收藏家如韦力、袁芳荣等人。代表作品如黄永年的《树新义室书话》，辛德勇的《书者生也》《那些书和那些人》《蒐書記》，陆昕的《闲话藏书》《藏书小识》；韦力的《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爱》，台湾藏书人袁芳荣的《古书犀烛记》等。

说实在的，我是最喜欢这类书话的。因为它的作者，都是一些“真读书人”，个个学养丰厚，态度认真；因之，其书话知识性强，有厚度、有思想，更洋溢着作者的殷殷“书之爱”。

第三种类型，姑且称为“书人书事”型书话。大多出自出版人或个别读书栏目编辑之手。因为职业特点，接触的读书人就多，所以“书”，仅仅是一个凭借，或者引子，更多的文字，是谈与读书人的“交往”：如何为某人出版一本书，如何向某人约稿；在酒桌上，某人如何谈笑风生，尽显其性格特点等。

我觉得：好书话，还是应该以“书”为中心，“人和事”只是插科打诨、生趣而已。而一旦书话被“逸闻趣事”，特别是那些“琐屑的人事交往”喧宾夺主了，那这“书话”格调就低了。

《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发布

近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领衔的“绿色GDP绩效评估课题组”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2017年全国卷）》。该报告基于学界对绿色GDP的界定之核心内核，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生态损耗，以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指数5个指标，综合呈现了全国内陆31个省自治区市的绿色发展情况。从评估结果看来，浙江、上海、广东、北京、江苏、重庆等省自治区市的绿色发展绩效指数居于前列，宁夏、云南、新疆在绿色GDP增幅超越GDP增幅方面，名列前三。

（任睿明）